

米歇尔·图尼埃：哲学与文学交相辉映 美感与思辨相得益彰

□陈 沁 曹丹红

当地时间2016年1月18日晚,法国著名作家米歇尔·图尼埃(Michel Tournier)赫然离世,法兰西文坛又痛失一位文学大师。法国总统奥朗德、总理瓦尔斯、文化部长佩勒林纷纷深情致辞以示哀悼,悼念这位被视为20世纪下半叶欧洲文坛上最重要的“才华横溢的伟大作家”(奥朗德语)。然而耐人寻味的是,这位曾令王小波惊艳不已,曾被《纽约时报》评价为“全法国最好也可能是最知名作家”的人,最初的梦想却与文学无关。

“哲人作家”的华丽转身

上世纪20年代,图尼埃出生在一个德国文化氛围浓厚的家庭,父母均是巴黎索邦大学德语语言文学系的高才生。可是,童年的图尼埃过得却并不怎么快乐。每逢假期,图尼埃的父母便将4个孩子送往德国弗赖堡的学生寄宿公寓,好让他们练习德语。1931年,图尼埃又因为健康问题被送往瑞士的一所儿童之家生活。成年后,图尼埃心灵上极度敏感,究其原因,与他童年时期的孤独以及战争密不可分。“9岁到11岁,我亲历了纳粹主义,在这之后又是战争”,在自传体散文《圣灵之风》中,图尼埃如是讲述自己的童年记忆。或许正是童年的这段经历为其名作《桤木王》的诞生埋下了种子。位于圣日尔曼昂莱的家被德国军队占领后,图尼埃一家只得举家迁往纳伊市。自此,图尼埃正式踏上哲学启蒙之路。授业恩师莫里斯·德·冈迪亚克对他倾囊以授。勤奋学习的过程中,他又结识同窗挚友罗歇·尼米埃(被法国文坛誉为“三个火枪手”之一的作家)。对哲学的极度热爱促使图尼埃高中会考后毅然选择进入巴黎索邦大学研修哲学。毕业后,他又前往德国蒂宾根大学继续攻读哲学专业,并在那里结识了他的两位毕生挚友——吉尔·德勒兹与海爾姆特·沃勒。前者是法国复兴尼采运动中的关键人物,这位法国后现代哲学家、结构主义大师为图尼埃的处女作《礼拜五或太平洋的灵薄狱》撰写了著名的《米歇尔·图尼埃与没有他人的世界》,后者在法学专业毕业后成为德国的一名检察官,专门负责审理关于纳粹的案件,并因此成为图尼埃文学之路上绕不开的重

要人物。

回到法国后,教师资格考试的落榜击碎了图尼埃的哲学教师梦。随后,他先后从事过翻译工作,进入过电台,后来又任职于普隆出版社,负责出版戴高乐回忆录。对图尼埃来说,出版社工作生涯最有趣的经历是有幸与当时负责出版传记的总负责人,后来曾担任过法国总统的乔治·蓬皮杜结下了不解之缘。43岁时,图尼埃终于得以才华大展——首部作品《礼拜五或太平洋上的灵薄狱》横空出世。此书一经出版立刻一炮而红,出版当年便荣获法兰西学院小说大奖。3年后,小说《桤木王》又一举夺得龚古尔奖,进一步奠定了图尼埃



《礼拜五或太平洋上的灵薄狱》法文版

《桤木王》法文版

在法兰西当代文坛上无可取代的地位。

图尼埃并不是一位高产的作家,一生总共出版过9部小说、6部故事集以及几部散文式作品。但图尼埃作品的质量上乘,每部作品都堪称经典之作。例如,《礼拜五或太平洋上的灵薄狱》取材于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是一部极其精彩的经典重构小说;《桤木王》则巧妙地借用了歌德最著名的同名叙事诗。图尼埃匠心独运地依托于一个个经典神话传说,妙笔一挥,经典故事立刻以崭新的面目焕发出全新的生机。图尼埃以文学为名,不断地探索并传达着自己对“轻”与“重”、“生”与“死”、“存在”与“虚无”等哲学理念的独特理解。1972年,图尼埃当选龚古尔学院院士。此后,图

尼埃开始在巴黎近郊谢弗勒兹山谷的一个小村庄里隐居,以便避开凡尘俗事,潜心写作。就在半年前,法国伽利玛出版社隆重推出了图尼埃的新书:《说给德国友人海爾姆特·沃勒的信(1967-1998)》。此时的米歇尔·图尼埃已是年逾90岁的鲐背老人。

跨越30年的遗作

《说给德国友人海爾姆特·沃勒的信(1967-1998)》乍看是一部书信集作品,实则不然。该书的妙处在于,书中所收录的23封信并非图尼埃亲笔写下的“书”信,而是一封封“口”信。在另一部作品《思想之镜》中,图尼埃曾经说过:“伟大的作家是,当读者翻开他的作品时,能够从中听到并且识别出说话者的身份。伟大的作家可以把‘口述’和‘书写’成功地融合在一起。”自1967年起,图尼埃与沃勒之间的联系就经常依靠这种“说”信的奇妙形式——两人把自己想写的信用“口述”的方式刻录在录音带或光盘中再寄给对方。如此一来,聆听者不仅能听到信的内容,也能感受到对方所处的环境与心情,甚至还包括一些有趣的画外音,例如家里嘈杂的声音和孩子们的笑声。两人将信件托付给挚友——法国昂热大学教授阿莱特·布鲁米埃,由她负责信件的选取、记录和出版工作。

对熟悉米歇尔·图尼埃作品的读者来说,“说”信集的另外一位主人公海爾姆特·沃勒并不是一个陌生的名字。二人不仅年少结交,1978年出版的《圣灵之风》中,图尼埃还曾向时任法官的沃勒献上敬意,以感谢他为自己创作《桤木王》提供的大量有关纳粹的材料。与此同时,沃勒还有一个重要身份,那就是图尼埃作品的德语译者。图尼埃绝大部分作品的德译工作都是由沃勒完成的。书中书信的选取显然也是经过精挑细选的。23封信按照时间顺序分为5个区间:1967年至1969年;1976年至1978年;1980年至1983年;1985年至1991年;1994年至1998年。长达31年的跨度几乎贯穿了图尼埃的整个文学创作历程。图尼埃在信中真情流露,不仅向挚友坦述了文学创作中遭遇的种种瓶颈,更首次披露正在创作而最终未能成形的作品。



米歇尔·图尼埃

《说给德国友人海爾姆特·沃勒的信(1967-1998)》法文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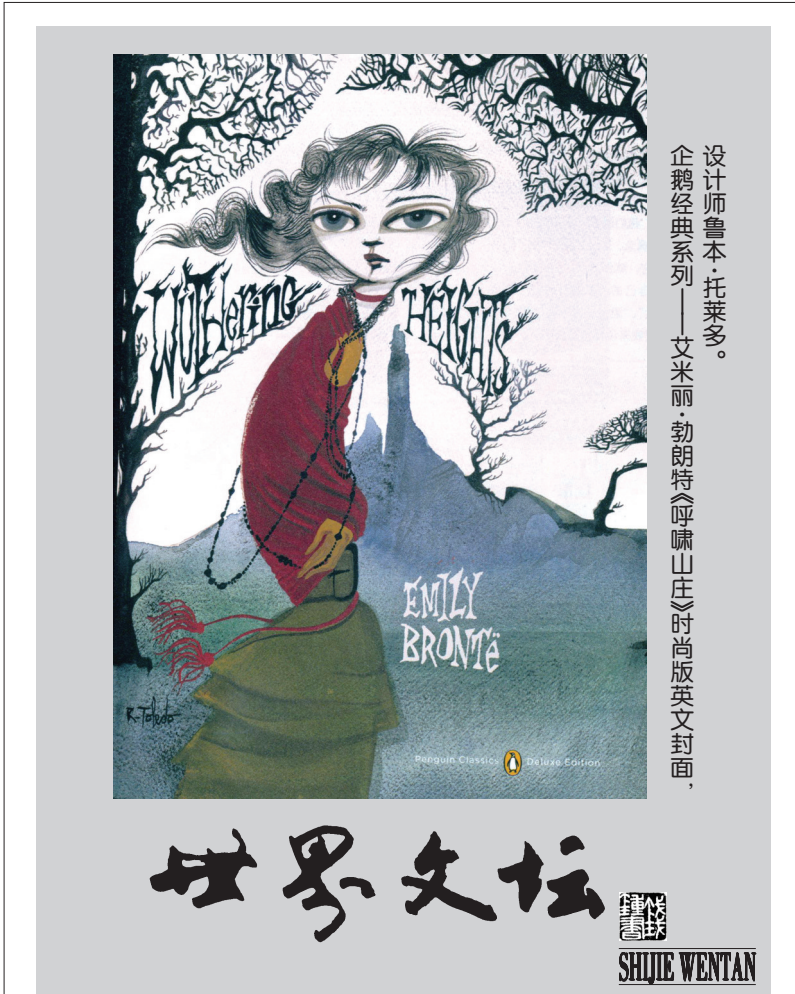
第一封信出现在1967年,恰逢图尼埃的首部作品——《礼拜五或太平洋上的灵薄狱》出版之际。1969年,图尼埃向伽利玛出版社提交了《桤木王》的手稿。为了给《金滴》一书找寻灵感,图尼埃于当年奔赴撒哈拉沙漠。不久之后,沃勒开始了图尼埃作品的德语翻译工作。1976年至1978年是图尼埃的创作高峰期:1976年,他开始创作《加斯帕·梅尔基奥尔与巴尔塔扎尔》,并创作《礼拜五或太平洋上的灵薄狱》的儿童版——《礼拜五或原始生活》。后来,他又前往埃及旅行,深受国王谷和卢克索城的震撼。1980年图尼埃受桑义

■书 讯

帕慕克《我脑袋里的怪东西》中文简体版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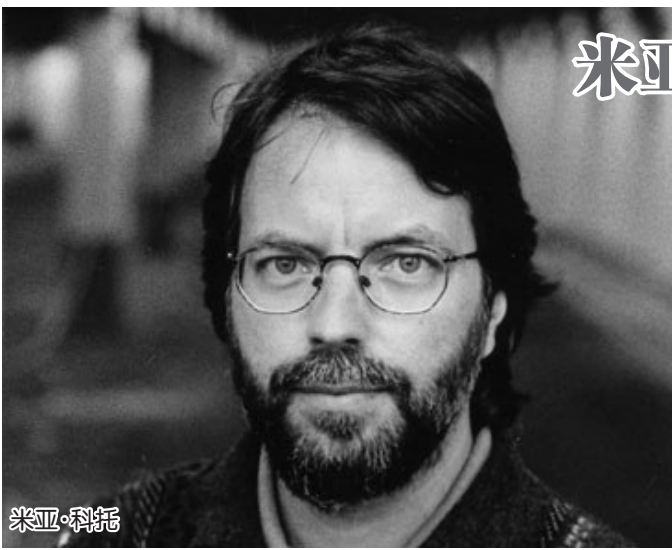
日前,诺奖得主、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的最新小说《我脑袋里的怪东西》中文简体版由世纪文景引进出版。

《我脑袋里的怪东西》讲述钵扎小贩麦夫鲁特的人生、冒险、幻想和他朋友们的故事,是一幅通过众人视角描绘的1969—2012年间伊斯坦布尔生活的画卷。在麦夫鲁特还是一个生活在安纳托利亚中部穷山村少年的时候,他就不住地幻想自己未来的生活会是怎样。12岁时他辗转来到“世界的中心”——伊斯坦布尔打拼,立刻被那些老城消逝、新城待建的景象所吸引。他继承了父亲的事业,在土耳其的街道上贩卖钵扎。他与那些在城市繁华外荒凉处的居民一样,渴望致富。但是运气似乎永远都不追随他,他看着亲戚们在伊斯坦布尔暴富并定居,而自己却花了三年时间给一位仅在他人婚礼上有过一面之缘的女孩儿写信书,最后却阴差阳错地和她女孩儿的姐姐私奔。麦夫鲁特人到中年,在伊斯坦布尔的街巷里做过许多营生,酸奶小贩、鹰嘴鸡肉饭小贩、停车场管理员……他珍惜自己的家人和妻子,可工作失意、生活窘迫仍不断挤压着他。无论如何,他仍然日复一日,漫步在伊斯坦布尔街头,一边卖钵扎,思念自己的真爱,一边琢磨着脑袋里冒出的一个又一个怪怪的东西,这些念头让他自感与众不同。他,一个没钱没地位的钵扎贩子,既属于这个大都市,又在头脑中不停地寻找着另一种生活。小说被称为是“关于伊斯坦布尔的编年史”,帕慕克用细腻的笔触,将一系列独到的视角、丰富的地理人文与激荡的社会变革等元素围绕在主人公周围,描绘了社会政治激荡这一大背景下小人物们的日常。(世 文)



米亚·科托《盲渔夫》：对莫桑比克的身份追寻

□陈雪儿



米亚·科托(Mia Couto),原名安东尼奥·埃米里奥·雷特·科托,1955年出生于莫桑比克第二大城市贝拉。在父亲影响下,他14岁在报纸上发表诗作,17岁进入大学学医。1974年“康乃馨革命”爆发后,米亚·科托转行成为记者。1983年其第一部诗集《露水之根》问世,发表于1992年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梦游之地》获得1995年莫桑比克作家协会虚构作品奖,并在2002年被评为20世纪非洲大陆十佳图书之一。2013年,米亚·科托获得葡萄牙语最高文学奖——葡萄牙卡蒙斯文学奖。

30余载的文学创作生涯中,米亚·科托在诗歌、杂文、短篇小说及长篇小说领域均有优秀作品。他不仅被公认为是最重要的莫桑比克作家之一,也是该国作品被翻译得最多的作家。他的许多作品运用带有鲜明莫桑比克烙印的葡语,力图将莫桑比克不同地区的语汇融入创作语言中,并且使用全新的非洲式叙述模式。

短篇小说《盲渔夫》选自米亚·科托的短篇小说集《每个人都是一个种族》,讲述了渔夫马内卡出海捕鱼后失明返回家乡的故事。作为米亚·科托作品中的重要主题,非洲语言的口语性以及非洲大陆的身份认同在在小说中得到了多样展示和深入探讨。主人公马内卡正是莫桑比克这个国家的隐喻和象征,他在海上的迷失以及失去双眼后的心灵流放都反映了莫桑比克的殖民历史、脱离殖民后的彷徨以及不断找寻身份认同的历程。在语言方面,丰富非洲口语的融入以及新造词的创造造就了小说的独特写作风格,增加了创作的可能性,深化了作品的内涵;在情节方面,故事叙述中多处暗含对莫桑比克过去的影射和反思,作者试图通过解读国家的特殊历史文化来找寻莫桑比克遗失已久的国家认同。



《盲渔夫》葡萄牙文

渔夫马内卡在某次出海时遭遇风暴,迷失在海洋中无法返回陆地。时间流逝,渔夫陷入了难熬的饥饿。为了生存,他不得不挖出左眼当诱饵去钓鱼。靠捕获的鱼支撑了一段时间后,面对饥饿的再次降临,渔夫只好又挖出右眼,并借此钓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条鱼。缓解了饥饿的渔夫重新获得力气却陷入黑暗,只能凭借感觉在海洋中以臂为桨去找寻陆地的方向,最终奇迹般地靠岸并返回家乡。

回家后的渔夫渴望重返海洋,却遭到了妻子萨利玛的阻碍。为了维持生计,妻子希望代替丈夫出海捕鱼,但是这无异于贬低一家之主的男性尊严,渔夫愤怒地驳斥了妻子的想法,开始拒绝妻子的照顾并疏远她。当生计难以维持,妻子再一次表达出海捕鱼的意思时,渔夫责骂了妻子,将渔船推到沙丘上,不再回家,与外界隔绝。

妻子给渔夫送饭时看到丈夫颓废的模样,央求渔夫像过去那样粗暴地打她,然而渔夫只是打翻饭盘并让妻子拿来火把,随后他放火烧了渔船。妻子倍感煎熬,决定不再理会自暴自弃的男人,将孩子带离他身边。失去妻子和孩子的渔夫就这样孤独地栖身于沙滩上。

一天夜里,天空突然落下冰雹。在绝望和痛苦中,不知如何躲避的渔夫一边跪在地上、举起双臂保护头,一边大声呼喊妻子的名字。一个疑似妻子的人将他带往一个小屋躲避灾难。日子一天天过去,神秘的女人只是照顾着渔夫却不曾开口说话,渔夫的状况渐渐好了起来。每天下午,渔夫都会秘密去树林中做

一件事。直到某天,渔夫交给女人一双桨,让女人划着自己为她造好的船出海捕鱼,并且告诉她自己决心去找寻失去的双眼。之后的每个早上,双目失明的渔夫都行走海滩上,试图找回自己的完整面孔。

渔夫马内卡与大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海同样深刻影响着莫桑比克的命运。15世纪末,葡萄牙人正是在开辟东印度航线时来到莫桑比克,并在此建立殖民地。海洋让渔夫失去双眼,殖民者乘着海浪的到来同样让这个国家在几个世纪的殖民统治后丢失了原有的身份认同,具有了与世界相隔绝的非洲大陆文化特性。

渔夫在海洋上所经历的流放——“这场流放,让他自此与大海隔绝的放逐,并非出自他的本意”——也是在暗指莫桑比克的彷徨。莫桑比克所面对的是殖民时期过后一个国家在文化和思想上的流放,是在世界版图中重新找寻自我身份的迷茫以及随之而来的多方面困难。

在情节架构上,挖出双眼这一事件是小说下半部分情节开展的基础,而“眼睛”在小说中也暗含特殊的意义。眼睛是人观察外界的窗口,对于自我和世界的沟通必不可少,正如文中所说:“渔夫回来了,却被剥夺了让我们成为人的最重要的东西:眼睛,即我们心灵闪烁的窗户。”由于失去了自我认知的途径——眼睛,渔夫也就随之丢失了人的身份,无法再依靠双眼去认识自我。对他带来的影响是隐喻身份认同的丢失给莫桑比克带来的混乱。隔绝于世界的文化特性让莫桑比克陷入无助的境地,让这个国家如同盲人一般陷入无边的黑暗中。

在渔夫奇迹般地返回陆地后,文中的一句反问为我们揭示了作者的隐含意义:“难道在失去视力的帮助后,他的双臂再次找到了返回的路吗?”我们或许可以推测,在挖掉双眼前,渔夫之所以没能返回陆地正是因为视力反而成为了阻碍。表面上看来,视力帮助我们辨清了方向,然而在茫茫的大海中依靠双眼去找

寻方向显然是徒劳的。失去视力的渔夫对外界更加敏感,凭借与生俱来的感觉找到了回家的路。这让我们意识到如果仅仅依靠双眼,很多时候所认识到的只是事物的表象。无论对于个人还是国家而言,在找寻身份认同的道路上,重要的不是流于表面、执著于所能看到的景象,而是要深入内在、发现不可见中的可见。因此对于莫桑比克来说,要找回遗失的身份认同,就应当透过多样而繁复的表象去探索深藏于国家内部的文化根基和文化支柱。

失明剥夺了渔夫重返大海的权利,在他看来这等同于动摇了他在家庭中的地位,所以他拒绝接受妻子的照顾,而是一次次将自己推向更加极端的孤独与隔绝中。失去双眼的渔夫变成了残缺的人,这不仅是身体更是心灵上的残缺。他无法定义自我的身份,因为生活中熟知的一切——海洋和捕鱼——都已经离他而去,他惟有在孤独中去探索内心、找寻生命的意义。当冰雹降临,沉默的女人拯救他之后,他焦躁不安的内心最终得到了安抚和平静。“马内卡就这样慢慢找回了时间”。经过自我挣扎,他摆脱了黑暗带来的恐慌,坦然接受了生活的巨变,甚至改变了对妻子的态度,同意妻子出海捕鱼。渔夫失明后的反常行为,也是一个国家在失去身份认同后的徘徊;渔夫深入内心的旅程就是莫桑比克在经历了与世隔绝和文化思想的流放后重新找回自我的历程。

《盲渔夫》不仅包含了对莫桑比克殖民历史和当下状况的描写,米亚·科托同样表达了对国家未来的期盼。小说最后一段描绘了渔夫试图找回自我的举动:“从那以后,在每一个如期而至的早晨,人们都看到盲渔夫沿着海滩徘徊,搅动大海在沙滩上拼出的泡沫。这样,在液体般的步伐中,他似乎是在一波波海浪中找寻他的完整面孔。”这段描写正是在隐喻莫桑比克的未来:虽然殖民者经由大海入侵了这个国家,虽然如今莫桑比克正在经历着苦难,但是在如“液体般”流逝的“步伐”里,莫桑比克不会忘记国家的历史和文化,一代代人都会继续找寻莫桑比克丢失的完整模样,正如一波波浪潮执著地涌上沙滩那般。